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



Continuity of Orthodoxy:

Kuomintang'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1927 ~ 1949)

接续“道统”

——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
(1927 ~ 1949)

吕厚轩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4005104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

B222.05
108



接续“道统” ——国民党实权派 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 (1927~1949)

Continuity of Orthodoxy:

Kuomintang'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1927~1949)

吕厚轩 著



北航

C1692281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B222.05

1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吕厚轩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209-07842-9

I. ①接…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国民党—儒家—思想改造—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406 号

责任编辑:马 洁

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

吕厚轩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开(170mm×240mm)

印 张 16.2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

ISBN 978-7-209-07842-9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888

总 序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青年者，学术之希望也。本“青年学术文丛”，即以汇聚青年，襄助学术为宗旨，以积累吾校青年俊彦之著述，展现人文社会科学之成绩为鹄的。

作为山东省重点高校，曲阜师范大学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校训，秉承“孔颜型范，春秋学统，海岱情怀，洙泗遗风”，数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众多精英人才及优秀师资，享誉海内。

“南沂西泗绕晴霞，北岱东蒙拥翠华。万里冠裳王者会，千年邹鲁圣人家。”岱岳之阳，洙泗之滨，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斯为黄帝诞生之地，少昊活动之墟，商奄旧壤，周公封国，素称人文荟萃之域，周礼尽在之邦。当春秋战国之际，天子失官，学术下移，私学兴起，诸子争鸣，九流十家，蔚为大观，此中华文化之轴心时代也。而此轴心时代之轴心人物，则鲁国之仲尼也。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上古文明之大成，端赖鲁国历史人文之得天独厚也。

遥想当年，夫子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明易道，制作春秋；杏坛设教，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弟子三千，七十二贤，成儒家之集团，士阶层亦以此登上历史舞台，兹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演为中国思想文化之黄金时代。时人已赞其“大哉孔子”“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弟子更叹“天纵之圣”“自生民以来未之有”。炎汉以降，士大夫及庶民无不尊崇孔子之道，其影响垂两千余年，且远播海外诸国，沾溉后世，垂范千秋。近世史家柳翼谋谓“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西哲雅斯贝斯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誉为人类思维范式的奠定者，良有以也。

孔子者，伟大教育家；曲阜，东方之圣地。立上庠于斯，其义深且大焉，

非特有功于一时一地，尤别具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大义也！曲阜师范大学建校迄今，庶乎一甲子矣。经数代曲园人之耕耘，今日之曲阜师大，已成师范教育之沃土，综合性之高等学府，拥有曲阜、日照两大校区，占地二千余亩，涵盖文、理、工、法等十大门类，名家荟萃，桃李芬芳，人文底蕴深厚，九州海外驰名。

然忆昔建校之时，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亿兆斯民，同心同德，戮力建设，气象一新。1955年，山东省师范专科学校建于泉城济南。翌年，举校迁圣地，更名曲阜师范学院，升为本科院校。长校者，高赞非先生也。高先生出郯城高氏，幼承庭训，及长，师事大儒黄冈熊十力与大儒桂林梁漱溟二先生，宅心仁厚，学养深邃。受命出任曲阜师院院长，筚路蓝缕，艰困万端，书“犹有洙泗遗风，更加众志成城”一联，勉励师生，奋力开拓，使曲园迅速崛起于教育界，其德其勋，永铭史册。尤可言者，高先生自建校伊始，即于孔子文化研究，颇属意焉。曲园之孔子研究，今日于学界占居一席之地，赖高先生开创之力也。戊午年杪，改革开放，国家，曲园亦随之振兴，文、史、哲、政、经、法、教、管、艺诸科，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数十年来，曲园之人文学术，扎根文化圣地，吸纳传统养分，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洙泗学人，僻处小邑，登三尺讲台，授业传道，退而伏案，执笔撰著，孜孜矻矻，未敢或怠，于学问亦三致其意焉。虽未得大都市之声华，然反得以沉潜学术，安心著述，此其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之谓乎！

学术之事，诚非同寻常之事也。梁任公有言：“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欲观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王静安亦谓：“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国家且勿论焉。而学术之于大学，事业之基也；之于学人，立命之本也。夫子倡“为己之学”，后儒秉“知行合一”之教，华夏两千余年之人文学术史，群星璀璨，光耀千古，不逊泰西，然近代以来，重理轻文之风大扇，新世纪以来，商业大潮席卷而来，人文社科无用论，甚嚣尘上；人文学者之清贫，有目共睹。尤其青年学者，于学术念兹在兹，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思维活跃，惜乎其资历尚浅，负累甚大，困难与机遇并存，痛苦与快乐兼具，民间所谓“青椒”一族是也。虽甘心寂寞，清贫自守，怎奈“压力山大”何！若此，欲得学术繁荣，岂不痴

人说梦耶？职是之故，纾困解难，助其一臂之力，走上学术之康庄大道，则学校主事者之所思所念也。有鉴于此，学校社科处积极谋划方案，多方筹集资金，设立“孔子文丛”，以襄助青年学者专著之出版，推动我校之人文社科学术之繁荣发展。

本文丛面向全校人文社科领域青年学者全面开放，凡符合条件之学者皆可自愿申报，学校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入选者由学校组织统一出版。自2013年始，每年拟出版一辑，每辑不超过10种。

综观当今之世，学术之发展繁荣，端在打破学科藩篱，开展学科对话，实现协同创新。然突破成规，谈何容易？必当审慎擘划，期以长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尺之台，起于累土。此“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计划，面向人文社科诸学科，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搭建不同学科交流之平台，其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之起点乎？其我校人文社科学术发展繁荣之基础乎？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编委会
2013年7月

目 录

contents

总 序 / 001

绪 论 / 001

第一章 国民党与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 / 025

第一节 孙中山与儒家思想 / 025

一、孙中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 026

二、儒家思想与孙中山的“革命学” / 029

三、孙中山晚年儒家情结凸显的原因 / 033

第二节 戴季陶儒化三民主义的初步尝试 / 044

一、“戴季陶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儒家化 / 044

二、戴季陶儒化三民主义的原因 / 052

三、戴季陶儒化三民主义的反响 / 060

小 结 / 064

第二章 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上） / 067

第一节 国民党官方哲学的构建 / 067

一、民生哲学的完善 / 068

二、“力行哲学”的出台 / 084

第二节 恢复固有道德和智识 / 098

一、《科学的学庸》 / 099

二、从八目到四维 / 109

小 结 / 117

第三章 国民党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下） / 119

第一节 教化与训育 / 119

一、学校教育 / 120

二、军人精神教育与党员教育 / 126

三、社会教育——新生活运动 / 135

第二节 重建民族文化重心 / 142

一、尊孔 / 142

二、文化建设运动 / 154

小 结 / 162

第四章 国民党实权派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原因 / 164

第一节 国民党自身的变化 / 165

一、由在野到执政 / 165

二、国民党的权威危机 / 173

三、民族主义的遗产 / 177

四、国民党党员成分的变化 / 183

第二节 儒家思想的老根新芽 / 184

一、儒家思想的根基尚在 / 184

二、新传统主义者的出现 / 186

第三节 蒋介石的个人因素 / 189

一、蒋介石的教育背景 / 189

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 / 192

小 结 / 195

第五章 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影响 / 197

第一节 “革命”还是“复古” / 197

一、意识形态魅力的丧失 / 198

二、国民党政治文化的落后 / 207

三、“新文化”与“新生活” / 219

第二节 “国粹”还是“糟粕” / 223

一、儒家思想的新推展 / 223

二、“反动”与“保守”的儒家思想 / 228

结 论 / 233

参考文献 / 241

后记 / 248

绪 论

一、问题缘起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壮志未酬的他，在遗嘱中念念不忘告诫自己的追随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职业革命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除了被正式赋予“国父”的尊号外，还被赋予了“中国正统思想的继承人”的名号，成为接续中国“道统”^①之人。

关于孙中山是中国正统思想继承者的说法，始作俑者乃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1925年6月，戴季陶在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记述了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一段谈话。戴季陶说：“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甚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复。”戴季陶以此为依据，强调“中山先生的思

^① 道统，一般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关于道统的起源，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家道统，表现为一历史顺序的统贯古今的“传道正统”的承传谱系。孟子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于孔子的圣圣相承系统，并以此传承为己任，韩愈重述孟子之旨，确认孟子的道统地位，创孟子死后道统不传之论，隐然以孟子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开宋儒程伊川、朱熹道统说之先河，孟、韩以后，儒家的道统谱系，说法有同有异，人物有添有除。第二种观点认为，道统一说，不是儒家自生自有的观念，而是受禅宗启发而来。钱穆先生即认为道统观念首先由韩愈提出，显然来自当时之禅宗；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也认为韩愈建立道统是受新禅宗传灯说影响。戴季陶在1925年首创孙中山承继中国“道统”一说，后此说被蒋介石接受，成为国民党官方儒化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①，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三民主义儒家化的进程。他的这种说法，在当时遭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激烈批判，并被冠以“戴季陶主义”的名号，以示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

戴季陶所说的俄国革命家，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而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和《马林回忆录》中，记述他与孙中山的谈话内容时，仅提到孙中山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但都没有提到道统说。^②孙中山在与马林的谈话中，是否强调“道统”一说，现在尚无定论。可不管历史真相如何，戴季陶关于三民主义“道统”说的出现，将三民主义与儒家思想相联系，使前者成为后者的继承者，无疑是三民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戴季陶的这一说法，在被压制了一段时间后，因蒋介石的欣赏而重见天日。1931年1月，蒋介石在演讲中表示，马林与孙中山对话的时候，他在现场。他说：“总理讲这句话是在广西桂林，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③意思是他可以证明戴季陶所说的是事实，借以破除外界对三民主义儒家化的质疑。自此之后，掌握了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实权的蒋介石一派，借助于接续“道统”一说，名正言顺地儒化三民主义，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实权派在其统治期间，打着接续“道统”的旗号，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和利用，在当时就引发了较大争议，有赞成的，有批判的。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界对此问题的评价，大同小异。一些学者认为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是完全反动和落后的，“由于孔子儒学与反动政治的结合，所以包括民国在内的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阶级都尊孔，一切革命阶级都批孔。……历史证明，对孔子儒学的批判往往与反封建革命

①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校内用书），1983年，第35页。

② 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4年，第452页。（以下统称《蒋总集》）

的彻底性成正比”^①。也有学者认为，国民党实权派此举，在抗战时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的来说，“戴季陶主义是蒋介石的封建思想与中国封建思想的中介体。……这是国民党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最初的理论形态和舆论准备”。“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利用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他同袁世凯、张勋利用儒学复辟帝制一样，使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声誉，受到很大的损害。”^②在革命史学的范式下，以上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上述看法则大多存有偏颇之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近现代历史上固然存在许多不适应时代潮流、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但它同样也包含一些积极的可以继承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已经内化成中国人日常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中不可或缺或难以改变的一部分，即使要改变，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笔思想文化遗产，无论是谁执掌政权，都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待它，即要考虑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从这个角度看，重新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的这段历史，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

其实，对于后现代化国家来说，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如今，学界在此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传统是后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利用继承与利用传统，大家的意见仍然是莫衷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化国家，近代以来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自汉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思想就一直被统治者作为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近代以降，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不断地掀起波澜，而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在冲突中一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儒家思想曾经有过积极的回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即是儒家思想最初回应西方文化冲击的产物。在此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标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使得洋务运

① 吕明灼等：《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4年，第386~387页。

② 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8、155页。

动备受质疑与批判，中国社会内部趋西趋新的思潮日渐流行，所谓“欧风美雨席而东”，即是当时思想界情形的写照。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引进新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儒家政治思想的权威地位岌岌可危，但它在私人领域，仍占据主流地位。民国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础，失去了主宰意识形态的功能。其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更是不比从前。但是，就在人们以为儒家思想已经衰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渐微弱的时候，它却又通过各种手段向世人展示了其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这其中，固然有复古派掀起的种种逆流，但也有新儒家对儒家思想的新推展；固然有各种政治势力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但也有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心平气和地讨论和研究。总之，儒家思想凭借着其博大的内涵和悠久的传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突出的是在政治方面，民国时期尤其明显。^①就当下来说，蒋庆所提倡的政治儒学^②，康晓光所宣扬的以儒家文化重建中国政治的观点，秋风等人主张的儒家宪政说，各地日益频繁的祭孔活动以及方兴未艾的读经运动，虽然遭到许多人的批判和反对，但谁也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这些活动是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还是儒家思想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当前中国知识界是要坚持五四的启蒙传统，继续清除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还是将儒家思想加以继承与改造，以期在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中发挥作用呢？其实，这早已不再是新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个问题就已经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只是我们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下探索的脚步。所以，继续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政治的关系，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除此之外，研究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还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① 参见吕明灼等：《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4年。

②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蒋庆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制度之建设，以往有三种立场：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是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一是新儒家的主张，即从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外王”，建立民主制度。而蒋庆在其书中提出，要继承孔子的王道理想，汲取《春秋》公羊学中的政治智慧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创立中国式的政治制度。

其一，关于重建中国社会共识的问题。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要想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这个国家或社会必须要有共识，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所谓的“共识”，笔者认为就是现代社会常说的意识形态。当然，笔者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词。“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人特拉西提出，原意是表达如何形成一种抽象的理论。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它实质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特定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认为，如果他们的计划得到实施，情况将比现在好得多。^①一般来说，西方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他们没有把中国历史纳入视野，因此也不会发现中国早在汉代就系统地利用儒家学说为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并有意识地用意识形态的认同来实现庞大社会的整合。^②金观涛认为，正是因为儒家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并长期延续。近代以来，儒家意识形态因无力应对西方的挑战，其权威性逐渐遭到质疑并最终丧失了合法性。儒家意识形态的崩溃，使得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要想恢复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更替。可是，在选择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中国人被那些源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搞得有点眼花缭乱。国民党提出了三民主义，共产党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意识形态虽然产生了，但它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还必须面对旧意识形态留下的遗产。因此，在现代中国，拥有新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要面对如何处理新意识形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问题。国共两党对此也都做出了回应。作为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很早就已经有意地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将其融入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在晚年尤其明显。孙中山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一方面为其革命事业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也为戴季陶、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儒化三民主义提供了依据。在南

① 参见[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作者认为，美国人有时对信仰意识形态的人觉得难以理解，他们看重稳健、调和与实用主义。但两个世纪前，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在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潘恩的影响下，为自由和自治的激情所驱动——打败了强大的和装备精良的英国人和从德国招募的黑森雇佣兵。作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也是有意识形态的。在笔者看来，美国社会的稳定，其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人在原有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共识。

②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实权派一向自诩是中国文化“道统”的继承人，并通过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利用。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唯物史观，将儒家思想看成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初始时一度要与它彻底“决裂”，抛弃旧文化，拥抱新文化。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发现，与传统彻底“决裂”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继承观念，这种文化继承观念一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但是，这种文化继承观念讲的仅仅是大原则，至于“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好统一。因此，关于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为现代意识形态服务的问题，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研究这一时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未来中国凝聚共识继续发展极具有参考价值。

其二，近代以降，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普遍王权的崩溃。“持续数千年的普遍王权，就其持续性及其对中国社会所起的整合功能来看，它的崩溃带来了特殊的破坏性的后果”。因为普遍王权是一个必要的链环，它使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高度地整合着，所以，随着普遍王权崩溃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也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破坏。^① 因此，中国人在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道德秩序的建构，即在重建政治秩序的时候，必须同时建构自己的文化－道德秩序。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儒家文化的威权没有了，但它在伦理上的许多观念仍然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更何况它的许多思想主张已经内化到中国人思想深处及日常行为中，在现实中如能巧妙利用，对于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意义非凡。所以，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重建中国文化和道德秩序的努力，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其三，学术界对儒家思想与中国近代政治关系的探讨还大多集中在单一政治人物与儒家思想这个维度上，从总体上探讨国民党与儒家思想的文章和论著还不是很多，而国民党实权派恰恰又以继承儒家的道统为使命，并积极付诸实践。国民党实权派此举，无论是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对国民党的生存与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还是对儒家思想本身，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

① [美]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此同时,关注国民党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对我们认识中国近代政治的演变也有所帮助。当前,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继承其中的积极因素。因此,研究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的成败得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儒家政治化、政治儒家化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国民党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民主共和国,但国民党毕竟是扎根于中国政治土壤中的政党,传统政治文化对它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因此,国民党实权派与儒家思想发生干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这一点,学界的研究还是有待深入,因为从现在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从总体上研究国民党与儒家思想关系的文章和专著并不是很多,且观点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合著的《儒学在现代中国》^①一书,是比较早地系统研究儒学与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关系的著作。作者对儒学和国民党的关系按时间顺序作了基本的梳理,对每一历史时期国民党对儒学的利用都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孙中山晚年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吸取了儒学中的精华,但也给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提供了借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儒学的利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蒋介石宣扬儒学为立国之本,一是新生活运动与儒学,一是陈立夫《唯生论》中的儒学。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一步利用儒学维护其统治,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儒家思想的利用对于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认为儒学就是国民党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一个工具。

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②一书中,对三民主义向传统的回归,作了简单的评述。他认为,1928年后南京

① 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

国民政府建立的社会结构，是和传统组织方式同构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一体化系统。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中，意识形态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为了使人民接受统治权威，必须把一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于是，三民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为了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划清界限，三民主义的基本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改变的是“民生主义”，清党前是用唯物史观讲解民生主义，清党后改用生的史观，这使得三民主义偏离了当时人们信奉的科学主义之主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说服力大大减弱；“民权主义”因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其魅力也随之消失；三民主义中唯一还有点号召力的“民族主义”，立足点也做了改变，不得不以中国文化为自己的符号，开始与儒家伦理相结合，演变成一种新传统主义。三民主义儒家化使得意识形态认同的组织力迅速减弱，社会动员力丧失大半，知识分子和政府出现了严重的离心倾向。国民党党内也因对此问题的不满凝聚力大大降低。总之，在作者看来，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贺渊在她的《三民主义与民国政治》^①一书中，结合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探讨了三民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各派政治力量根据各自的立场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诠释。该书有一章专门探讨戴季陶、蒋介石与三民主义的儒家化问题。作者认为，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从容易拨动人们情感之弦的民族主义出发，将孙中山的革命动机及三民主义理论本体与中国古老文化联系起来，将孔孟的伦理思想，改造成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蒋介石后来大讲伦理建设，实际上深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义。虽然蒋介石对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继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近代色彩，但儒家思想还是成了他们的是非标准，他们都是从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出发去理解接受三民主义。其结果不难想象，经他们之口宣传的三民主义必定弥漫着儒家的气息。

张军民在《对接与冲突——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②一书中，系统考察了孙中山逝世后各政治派别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与利用。该书第一部

① 贺渊：《三民主义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② 张军民：《对接与传统——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